

汉派小说的语言策略与武汉城市文化的书写

——以方方的创作为中心

肖敏

(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 430056)

摘要:方方的小说创作与武汉这座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小说的人物语言不仅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透视武汉的城市品格,而且其点到为止的描述,达到了一种疏离的艺术效果。方方小说的叙述语言的地域性相较于其他武汉作家来说不是最强,但带有浓重的诗性特征,其近期的作品多以诗性叙述语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挖掘武汉的城市文化,从侧面彰显了武汉在世俗中隐藏着的诗意哲学内涵。方方还采取了各种句式手段来达到其书写城市的创作目的,比如叠加、变异、长短句的变化等。

关键词:方方;汉派小说;语言策略;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3)06-0121-05

一、引言

地域之于文学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中外文论均有论及。《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南方的《楚辞》“瑰诡而惠巧”,明确了地域与文学的关系。19世纪法国文学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作为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进程,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逐步发展成熟,一些城市的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和审美情趣,继而潜在影响到其作品的艺术特征,甚至可以孕育出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譬如,北京之于老舍,上海之于穆时英、张爱玲、苏青,广州之于欧阳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新时期文学中,相当数量的一批作家依托其生活的城市,汲取城市的文化精髓,形成了独特的城市书写的美学风范。而作家们在具体的作品中,总要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实现其创作的目标,在这些艺术手段中,语言显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汉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方方在创作中如何

运用种种语言策略来达到书写武汉城市文化的目的,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与一般具有城市文化创作特征的作家不同,方方小说语言中的“本土”性并不是很强。相比较而言,有一些当代作家在复原城市口头语言、展现城市风情方面,可能做得更细致一些。譬如,王朔在《顽主》《过把瘾就死》等作品中,以原汁原味的京味语言表现了当代北京青年的思想特征;何顿在《我不想事》《弟弟你好》《我们像葵花》等作品中,以纯熟的长沙方言,展现了处于社会变革期的湘地重镇长沙的文化风情。实际上,方方小说的语言并不以纯正的“汉味”见长。这一方面是因为作家并不打算过多地倚重还原本地语言之手段,来达到书写武汉的创作目的;另一方面,作家也并不止步于一般性地书写武汉的市民性特征,而是试图借助于各种语言手段和艺术方式来表现武汉深层的文化品格。

众所周知,方方与武汉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自幼年时代随调动工作的父母来到这座城市,方方就一直在这里求学、工作。多年来,方方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武汉城市建设中的文化保护,如对汉口租界老房子的保护、对东湖门口小路命运的关注等等,与此同时,方方还写了《阅读武汉》《汉口的沧桑往事》《汉口租界》等描述武汉历史文化的集子。而

收稿日期:2013-03-22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武汉方言与汉派文学研究”(13j191);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学评奖与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发生”(2012G228)

作者简介:肖敏,女,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在小说创作中,方方更是以独到的艺术描写,营造一个丰满的武汉城市文化形象,而语言策略更是其中的重要艺术手段。

二、方方小说的人物语言与武汉城市品格

武汉之于方方创作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她曾说:“武汉的人文历史对于我就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每每看到江城的都市风景,带给我的不只是灵感,更有创作的力量和源泉。”^[1]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方方就用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和审视着武汉这座城市,表现出武汉生活中各种酸甜苦辣,展现了一个原生态的文化武汉形象。在方方的笔下,武汉这座城市的坚韧、隐忍、顽强被描写、放大,那种生长于巷陌弄堂的生命哲学被作家强化。作家在展示武汉人日常生活的时候,往往以其恰如其分的人物语言,构成一个完整的市民形象谱系。

首先,方方小说的语言描写十分契合人物各自的身份,作家往往用寥寥数语就挖掘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风景》通过武汉河南棚子一户家庭九个孩子杂草般的成长过程,表现了市民阶层近乎残酷的生存状态。父亲是一个码头工人,喜欢反复讲述自己过去混码头的社会经历,并要求孩子们老老实实地听着。小说中有这么一个细节:

有一次二哥想上他的朋友家去温习功课以便考上一中,不料刚走到门口,父亲便将一盘黄豆连盘子扔了过去。姐姐大香和小香立即尖声叫起。黄豆撒了一地,盘子划破了二哥的脸,血从额头一直淌到嘴角。父亲说:“给老子坐下,听听你老子当初是怎么做人的。”^[2]

仅仅一句“给老子坐下,听听你老子当初是怎么做人的”,就将父亲身上那种旧社会过来的流氓无产者的粗鄙、无知、强势描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多有着不幸的人生际遇。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是二哥,少年二哥在结识了杨朦、杨朗兄妹之后,才了解世界上居然有这样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二哥试图以发奋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文革”袭来,二哥爱慕着的女孩杨朗委身于生产大队书记以期回城。了解真相后的二哥自杀,死前用一个句子来回回答好友杨朦自己为何要自杀:“不是死,是爱。”这里,“不是死,是爱”是曾经被少女时代的杨朗朗诵过的诗句,与整部小说中直白、粗俗的人物语言,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无疑成了二哥理想主义幻灭的映照,也显示了中国当代市民阶层的残酷生存

状态。

同时,方方比较擅长用一些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口语来展现武汉人的精神气质。譬如《中北路空无一人》,小说开头写郑富仁带着生病的老父去医院的途中,路过没落的老牌国企武重厂时,父子间有这样一场对话:

车稳稳的,并无摇晃。父亲突然就睁开了眼睛。

郑富仁正欲问,醒了?感觉怎么样?话未出口,父亲像个健康人一样呼地坐了起来。惊道:我们厂门到哪里去了?说完又说,门口的场子咧?怎么光剩下这两棵树?

郑富仁说:那不是,缩在那里头。

父亲说:国际玩笑吧?开这小个门,那还是我们厂?

郑富仁说:时代不同了,你们厂早就没得戏了,你操那些心做什么事?躺倒,命要紧。

父亲说:屁话!厂子都没得了,命有什么事用?

郑富仁说:这才真是屁话。

郑富仁话音未落,父亲轰然躺下,再次昏了过去。郑富仁大声喊了起来,金刚,快点!撞到个鬼!老头子又昏过去了!^[3]

父亲为自己工作的国企奉献了一辈子,郑富仁则对父亲不合时宜的正统思想表示厌弃。文中出现了“么样”、“么事”、“躺倒”、“撞到个鬼”等方言词语,都是武汉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语。小说中的郑富仁尽管穷困潦倒,但基本继承了父亲正直的品格。在一般情况下,“撞到个鬼”等负面性的话似乎不该出现在一个孝顺父亲的中年男人口中,但若考虑到生活中有人会用类似于赌气的口气表达对熟人和亲人的关注,因此从郑富仁口中蹦出“屁话”、“撞到个鬼”倒并不奇怪了。而在武汉人的日常口头表达中,有一些武汉本地人可能习惯使用“板妈的”、“婊子养”等词表达对好友的熟悉和亲昵,在很多外地人看来,这类口头语言似乎不雅,但对于性格直白、豪爽的武汉人来说,则是再正常不过的语言了。

《中北路空无一人》中的郑富仁尽管与父亲经常发生口角,但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依然牢固地存在着。郑富仁直白、坚硬的语言方式,实际上就是部分武汉人思维方式的表现。而方方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之所以透露着几分粗俗,究其实质,是由武汉的城市特征造成的。极端的气候(夏季酷热,冬季苦寒)、商业化和功利化的城市文化,使得武汉人长期以来形成了泼辣、敢爱敢恨的性格,许多武汉人已经习惯了用直接的方式表达情感。

总之,方方的人物描写并非是对武汉人惯用表述语言的完全照搬,作家也没有为了追求所谓的栩栩如生,就在作品中长篇累牍地复制武汉人的口头语言,而是点到为止,这样反而达到了一种疏离的艺术效果。

三、方方小说的诗性叙述语言与武汉城市文化的开掘

方方历来不以对武汉文化的现实主义细节还原见长,这也是在武汉作家中,方方小说的人物语言的地域性并不是最强的原因。作为一个具有知识分子特征的作家,方方尤其注意通过具有个性的叙述语言,挖掘出武汉的历史文化内涵。总体来说,方方作品的叙述语言具有浓郁的诗性特征,这也是方方在若干武汉作家中显得独特的地方。不论是《风景》《白驹》等早期的作品,还是《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等较近的作品,都显示了其营造诗性艺术结构、开掘城市书写方面的努力。

从小说的内容来说,方方通常用知识分子的身份来描绘生活在武汉中下层群体的生存状态,这就意味着作家要以日常话语来表达这个群体的行为和思想,但又不能流于肤浅。在方方较早的作品中,其比较注重用口语陌生化来达到诗性语言写作的目的。

在《白驹》《白雾》《夏天过去了》等早期作品中,方方惯于用跳跃性的语言来构造小说。如在《夏天过去了》中,作家用类似于音乐乐章的形式和诗意的叙述语言表达了少男少女在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情感波动。而在《白雾》中,作家又用口语的陌生组合达到其诗性写作的目的:

田平他爸每次训导儿子都有根有据有理有节。田平虽不服气,但其辩说都不及语文老师精辟具体逻辑性强,无可奈何,便只好佯装工作辛苦疲劳之极拖长音调打着呵欠迅速上床将脑袋埋在被子里然后大骂老头子乃天下头号势利眼。^[4]

在这一串叙述语言中,作家有意省略了标点符号,形成了文本冷峻幽默的特征,也为作家的诗性语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方方较近期的作品中,《水在时间之下》更是将武汉这座城市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予以文化上的书写。应该说,《水在时间之下》所体现出的“叙述”的气度,在方方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气度,首先体现在小说纵横捭阖地将武汉的城市

发展史楔入到女性个人史的叙述中。女主人公生活的年代,恰恰是现代意义上的武汉发展黄金期,水上灯、玫瑰红这些女艺人之所以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光彩,与现代市民文化有直接联系。市民阶层的兴起、地方戏剧的兴盛、各种演出场所的开设,都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城市的标记。这些在九省通衢的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水在时间之下》牢牢把握了“武汉”这个核心语词,将女主人公的独特人生与城市的发展史联系起来,使得作品的意味格外丰饶。在读完作品之后,我们可能会对小说中这样的细节有印象,即玫瑰红在与恋人万江亭私奔前夕,这样思付:

那她岂不是永无回汉之机会?如果回不来,留在芜湖?那里人生地不熟,就算演戏,听汉剧的戏迷又有几个?留不下芜湖,去北京?那是京剧的天下,汉剧能讨口饭吃,已是顶了天,怎能指望红起来?红不起来,又哪里会有好日子过?且不说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什么吃的都没有。上海南京有菜吃,可人家有自己的戏,听汉剧只是图个新鲜,新鲜劲一过,谁还会搭理你?^[5]

玫瑰红固然离不开武汉,水上灯更是如此,她之所以没有撤退到重庆,除了与张晋生的“爱情”之外,骨子里未必没有对武汉的留恋。换言之,武汉是水上灯、玫瑰红们生存的大舞台,也是整个小说展开的背景。在《水在时间之下》中,作家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旧戏曲演员的学戏过程、汉口普通市民的生活、租界的生活,现代汉口的生活风貌得以展现。应该说,这样由女性写作的角度切入到城市和社会的写作方式,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水在时间之下》中主人公经常会生发出一些诗性的或者带有哲理性的语言,在《水在时间之下》中,作家的叙述语言具有浓重的诗性特征。小说的楔子是这样写的:

这世上最柔软但最无情的利刃就是时间。时间能将一切雄伟坚硬的东西消解和风化。时间可以埋没一切,比坟墓的厚土埋得更深更沉。又何谈人心?脆弱的人心只需要时间之手轻轻一弹,天大的誓言瞬间化为粉末,连风都不需要,便四散得无影无踪。^[5]

在作家的叙述语言中,时间这把利刃埋葬了一切人心和誓言,小说自此开始了对女主人公多舛一生的讲述。水上灯身上有着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最后被具有宿命色彩的命运打败,消散在时间的长河中。女主人公的命运,实际上是武汉这座城市的生命力的象征,主人公身上的顽强、不屈、世俗,乃至市侩,都是这座城市所赋予的。在世俗化的表征之下,

这座城市也有着令人赞叹的活力和生命力。水上灯最终隐没于街衢巷陌,在贫苦的生活中收留智力失常的异母哥哥,这种仁义和从容,也是基于城市文化之上而生发的。作家诗性的叙述语言,实际上从侧面彰显了武汉这座城市在世俗性中隐藏着的诗意哲学内涵。

四、城市文化内涵的挖掘与 方方小说句式特征的变化

在方方的创作中,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前期和后期的作品在句式上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折射出作家在书写城市历史、挖掘城市文化内涵时表达方式的不同。

方方早期的创作尽管也塑造了大量城市青年的形象,表现他们的奋斗经历和思想过程,但在这个阶段的作品中,作家一般较少有意地凸显武汉本地的文化色彩,在句式上多采用叠加、变异的手法,形成了文本较雅化的特征。这种雅化与方方早期不太注重描绘武汉的日常生活场景密切相关。这个时期的方方要么将武汉单纯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地点而不加以较多描绘(《白驹》《夏天过去了》),要么挖掘武汉作为一座市民化城市的历史沿袭特征(《风景》),这些都不太需要直白的写作方式。

在方方早期作品中,叠加的手段比较多样。首先,叠词在方方早期作品中比较多见。叠词是词句叠加的常用形式,既可以加强语言的节奏,也可以增加文学作品的感染力。《白驹》中有这么一段:

质问者们想想也是,活儿虽是自己这一伙干的,但自己得归人家管。自然得看着人家红红胖胖地安顿好自己的日子再用一点闲暇来安顿尔等诸位。

方方作品中的叠词往往是为了加强讽刺的效果而有意为之的,“红红胖胖”是AABB的形式,作家使用这种形式辛辣讽刺那些为官者,并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传神。

除了叠词之外,方方早期小说还采取语义叠加的方法来加强叙述的效果。譬如《白驹》中有这样的话:

“好在香香姿色尚在,名声又大,且腰袋里钞票饱满厚实,为此英俊小生全心全意肝脑涂地一塌糊涂地拜倒在香香的超短裙下也是大大可以理解的事了。”

在这里作家用了“全心全意”等三个意义十分相近的词语,形成了叠义的效果,将围绕在香香身边的年轻小伙子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一种冷

幽默的效果。

另外,在方方的小说中,读者经常看到变异的句子,之所以出现这些变异的句子,多是作家采取了异常的语句组合方式,最终达到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就变异这种手段而言,方方时而采取语义变异的方法,时而采取语法变异的手法,最终形成了摇曳多姿的叙述效果。譬如,在《状态》中有这样的句子:

虽说有些事情做得不太体面,私下也自愧很不哲学,可为了自己的远大前程,也只好委屈哲学了。

在《看不见的地平线》中有这样的句子:

它把严肃的天空和谦逊的大地缝合在一起,使得焦躁的、骚动的、盛满牢骚的心灵一点点地平静。

在这两处,前者中“哲学”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名词变异为形容词使用,是语法的变异。此处的变异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几个毕业于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放逐理想、谋取功名的野心,以及在这种过程中不安的心理;后者将“严肃”、“谦逊”这样一般用于形容人的词语用于形容物,描述了人物内心的焦躁和不安。

叠加和变异等手法的频繁使用,使得方方早期小说的句式从表述上更为精雕细琢。到了后期创作中,方方开始有意识地用直白的语言进行写作。譬如《万箭穿心》有这样的句子:

万小景早习惯了李宝莉的喋喋不休。她笑了起来,说那是你找了个好男将,他的八字强,扭转了你的运道。李宝莉忙说,是是是,正是马学武这个狗日的帮我转的运。

李宝莉你绝不能好事这对狗男女!李宝莉你不能让他们在人间仙境享福,自己却在人间地狱痛苦!李宝莉你要是有板眼,得把他们放进地狱里去。

老板又连叹几口气,说那是那是。我当然要照顾你。只不过,一个女人干这行,残薄了。^[6]

在这里,作家使用了“男将”、“板眼”、“残薄”等武汉方言词语,将这位武汉“女将”李宝莉的刚强性格异常生动地表现出来。

方方是一个有着浓重知识分子色彩的作家,她被公认为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作家。新写实主义小说在文学精神上以放逐崇高为主要特征,在写作上坚持作家情感零度的介入,“新写实主义作家取消了热奈特所谓的叙述者的‘思想职能’,他们不想让叙述者的情感介入故事,干扰读者的独立判断”^[7]。方方尽管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领军人物,但她的小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放逐崇高,也并非真的是情

感零度。这一点,可以在方方在对长句和短句的取舍上看得出来。在早期创作中,作家在描绘一些具有倾向性的场景时,惯用长句。《风景》中有这么一段:

每当在街上看见男人低三下四地拎一堆包跟在一个趾高气扬的女人身后抑或在墙角和树下什么地方看见男人一脸胆怯地向女人讨好时,他就恨不得冲上去将那些男女统统揍上一顿。^[2]

在这一段中,作家有意通过超常的长句来表达人物的那种愤恨、气恼的心态,并侧面透露出作家嘲讽、调侃的情感倾向,如果使用短句,那么生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到方方的后期创作中,长句则使用得较少了,如《万箭穿心》中有这样的描述:

站在平台上,看楼外万家灯火,李宝莉跳下去的心都有了。远处江边的路灯,比往日更加明亮璀璨,在寒风中散发着橙色的暖意。楼下的花坛转盘不时有汽车环绕,几条马路的灯,光芒四射一样,像是从李宝莉脚下的大楼散发出去的。李宝莉恍然记起十几年前,父亲和母亲过来看房子。父亲说这房子的风水叫作万箭穿心。^[6]

这里基本都是短句,叙述的是李宝莉在面对被儿子赶出家门时大彻大悟的心理状态。在作心理描写的时候,作家还描写到那种宿命论的命运怪圈的荒谬性。这种探讨命运的沉重话题,若在方方的早期创作中很有可能使用繁复的长句,但在这里却密集使用短句,可见作家化繁为简的语言功力。不论是有意加入方言,还是频繁使用短句,都意味着作家开始用精炼、生动的语言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万箭穿心》的女主人公用十几年的时间反思和忏悔,用血肉之躯供养儿子和公婆的生活,最终接受被扫地出门的命运,这种历经苦难而矢志不渝,这种在恶劣的环境中求取生活的生命哲学,无疑是武汉这座城市所赋予的,因此可以说,作家的艺术功力又提升了。

五、结语

方方小说的语言策略,在武汉本地作家中,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就作品语言的汉味来说,方方的小说显然不如彭建新的小说那么纯正。彭建新的《红尘》三部曲以对武汉民俗和武汉文化的描摹见长,

在小说中,各阶层武汉人的原生态口语得到较好的展示。作为一个具有知识分子色彩的作家,方方注重挖掘武汉人的精神状态和城市文化品格,较少大规模地使用武汉口语。与另外一个著名的武汉作家池莉比较起来,方方的小说语言也显得格外不同。

譬如,方方是这样描述大学老师被行政人员要求去练歌的情形的:

学校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先讲了为迎接“五一”劳动节唱歌之意义一二三,并说知识分子比方在座的各位教授也都属于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工人阶级是劳动人民,所以在座的各位教授也是为自己的节日讴歌,教授们想反正也没个专门的知识分子节,搭着工人阶级的份儿一块过“五一”也挺好,便纷纷点头说是呀是呀。(方方《行云流水》)^[8]

而池莉是这样描述一个中年女性知识分子出席商人饭局时的尴尬的:

戚润物对饭局的想象力比较苍白,首先她没有想到美人捞真的是美人下海捞鱼,二来她也没想到客人多得连握手都是批发式的,名片如雪花飘飘。(池莉《小姐你早》)

方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因而她的作品中书面语与俗语的相互结合较多。池莉的市民生活经验较丰富,其作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小说语言讥诮、平实。可见,方方的小说语言在武汉作家中的确显得独特:武汉这座城市赋予方方的艺术营养,已在其创作中得到了非常丰富的印证。

参考文献:

- [1] 方方. 武汉的人文历史给了我灵感[N]. 武汉晨报, 2005-06-14.
- [2] 方方. 风景[J]. 当代作家, 1987(5).
- [3] 方方. 中北路空无一人[J]. 上海文学, 2005(5): 220.
- [4] 方方. 白雾[J]. 人民文学, 1987(8).
- [5] 方方. 水在时间之下[J]. 收获, 2008(6).
- [6] 方方. 万箭穿心[J]. 北京文学, 2007(5).
- [7] 南帆. 新写实主义: 叙事的幻觉[J]. 文艺争鸣, 1992(5).
- [8] 方方. 行云流水[J]. 小说界, 1991(6).

责任编辑: 刘伊念

(E-mail: lyusy@jhun.edu.cn)